

从欧阳修到苏轼:平山堂书写的多重变奏

刘泽华^{1,2}

(1. 河北大学 文学院,保定 071000;2. 四川师范大学 三苏研究院,成都 610068)

【摘要】知扬时期的欧阳修随着自身处境的改换,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庆历士大夫“众乐”书写的潮流中,他于扬州城西北营建的平山堂却承载了与时迥异的闲情“独乐”记忆。嘉祐初,欧阳修送别因卷入温成皇后事件而无奈外任的刘敞知扬,作《朝中措》劝诫其及时行乐,显露出平山堂的“独乐”内蕴。面对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的人文内涵,梅尧臣、刘敞、王安石在唱和时基于个人的境遇和心态展现出了顺应、躲避与对抗的不同态度。元丰二年,在王安石新学隆盛之时,苏轼赴湖州任途中过平山堂,作《西江月》怀念欧阳修,隐晦表达了渴求儒学之道重新整肃风气、扭转局势的政治诉求。经由苏轼等人的书写,欧阳修的美政与士大夫精神成为平山堂的所指。

【关键词】欧阳修 苏轼 平山堂 梅尧臣 刘敞 王安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25)04-0065-16

在宋代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文化中,朝中失意官员外任地方时氛围往往较为宽松,同时又保有被调任回京的可能,这使得官员频繁往来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环境的改换与风景的差异也易激起官员们的题咏与经营(建造或修缮)。在仕宦生涯中,对景观的书写和经营往往贯穿着士大夫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内涵。

平山堂由欧阳修于扬州任上建造,经其本人及梅尧臣、刘敞、王安石、苏轼等人的题咏,成为有着丰富人文内蕴的著名景观,后世几经颓坏又几度复建,平山堂几乎成为欧阳修本人及其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的能指。近来学界对于平山堂多有关注。^①然而,从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营建平山堂到嘉祐元年(1056)的八年间,其本人没有任何诗文直接描写平山堂,梅尧臣两度过扬造访欧阳修也未有诗文提及平山堂。直到嘉祐元年三月刘敞出守扬州时,欧阳修写下脍炙人口的《朝中措》(平山阑槛倚晴空),才引起众人对平山堂的题咏;但此热潮很快又消弭下去,直到元丰年间才有苏轼“三过平山堂下”的题咏。欧阳修、嘉祐年间士大夫群体以及苏轼的平山堂书写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差异?这一过程有着怎样的思想史内涵和诗学意义?本文试图将平山堂书写这一文学现象置于政治史、思想史中进行整体考察,对以上一系列问题再做探究。

收稿日期:2024-10-29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三苏研究院一般项目“空间记忆视域下苏轼的景观书写与营造研究”(SSYJY24-07)

① 参见王兆鹏:《欧阳修对扬州平山堂景观的建构与书写》,《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肖鹏、王兆鹏:《欧阳修〈朝中措〉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莫砺锋:《每到平山忆醉翁——简论苏轼与扬州平山堂》,《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一、“众乐”中的“独乐”变奏：欧阳修平山堂的营造

随着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进入权力中心，庆历三年到四年之间，朝堂掀起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然而，新政开始不满一年，主持新政的核心人物便相继调离。四年冬，改革派苏舜钦、刘巽、王益柔等人相约宴集，醉后吟诗作歌，言语间对仁宗流露不满。李定未受邀参加，心怀怨恨，因而大肆宣扬此事，御史王拱辰借机发难，最终导致新政派十余人黯然离京。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诬与甥女张氏有染，朝野议论。此案也终于成为庆历党争的延伸，致使欧阳修被贬滁州。

庆历八年二月，欧阳修量移扬州。他在抵扬后撰写的《扬州谢上表》中道：

上繁天听之聪，终辨狱辞之滥。苟此冤之获雪，虽永弃以犹甘，而况得善地以长人，享及亲之厚禄。坐安优逸，未久岁时，亟就易于方州，仍陟迁于秩序。有以见圣君之意，未尝忘言事之臣。^①

张甥案得以辨明让笼罩欧阳修已久的阴霾逐渐散去，扬州繁华富庶远胜滁州，可谓“得善地以长人”，更让欧阳修感到愉悦的是仁宗“未尝忘言事之臣”。可见，此时他的心态与外任滁州时相比已发生了转变。在贯彻宽简之政的同时，欧阳修也把注意力放在山水之乐上，大概四五月间于扬州城西北蜀冈大明寺旁营建平山堂。

关于蜀冈，《诗话总龟》载：“淮南蜀冈者，维扬之地也。或曰势连蜀土，或以产茶味如蜀茶云。”^②《輿地纪胜》谓蜀冈：“旧传地脉通蜀，故大明寺之侧有蜀井，或曰蜀岗产茶味如蒙顶，故以名岗。”^③可见在宋人的观念中，蜀冈的命名源于其地脉与蜀地相连，因此其地所产的茶叶也与蒙顶茶味道相似。蒙顶茶为四川雅安蒙顶山所产，唐宋时便为贡茶。王庠《蒙顶茶记》谓：“贡茶之郡十有六，剑南惟雅一郡而已。”^④蜀冈在扬州独特的地势让平山堂可以远眺长江南岸。^⑤欧阳修谓：“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⑥平山堂之名也因此而来。^⑦

欧阳修在到任扬州的次年，给前任太守韩琦的书信中自诉营造平山堂等景观的动因：

广陵尝得明公镇抚，民俗去思未远，幸遵遗矩，莫敢有逾。独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琼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大明井曰美泉亭。琼花曰无双亭。^⑧

韩琦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即外任扬州，直至庆历七年改知郢州。欧阳修作为韩琦的继

①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扬州谢上表》，中华书局，2001，第1326页。

② 阮阅编，周本淳点校：《诗话总龟》卷三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304页。

③ 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輿地纪胜》卷第三十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第1157页。

④ 王庠《蒙顶茶记》已佚，所引佚句见《輿地纪胜》卷第一百四十七，第3130页。

⑤ 《避暑录话》云：“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参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大象出版社，2019，第7页。

⑥ 同①书卷一百四十四《与韩忠献王书（八）》，第2334页。

⑦ 李壁注云：“江南诸山，拱列檐下，若可攀取。因目之曰平山堂。”参见王安石撰，李壁笺注，董岑仕点校：《王安石诗笺注》，中华书局，2021，第1249页。

⑧ 同⑥。

任，所谓“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不仅仅是在营建平山堂、美泉亭、无双亭等景观上，更是要延续韩琦在扬州的美政。然而，欧阳修实际所为却与所言不同。

韩琦自述至扬州后“城闾隳残，奸讹固结。既思绳葺，必务躬亲”^①。在离开扬州前作《扬州亭壁题名记》，追溯藩镇割据以来扬州倾颓，至宋朝方“民安惠养，日以完复”。于是他考索扬州历来知州的姓名、政绩，“刻石于厅事之壁”，同时希望“后之来者，阅其官氏，推访治迹，则善恶皆有所倣云”。^②其中隐含着将自己在扬州的政绩也铭于史册、以示后来的意图。可见，韩琦对自己在扬州的政绩颇为自信。韩琦在扬州的诗文主要有咏物自比和关心民瘼两类，前者如《琼花》《啄木》，自诉志向高洁不得于时；后者如《广陵大雪》《岁早晚雨》，在面对灾害时感叹民生多艰。总之，韩琦在扬州任上的政治和书写，都体现着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与庆历士大夫精神相契合。

进而再考查欧阳修在扬州任上的情况。据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欧阳修知扬时期作诗文共31首（篇）。^③将这些作品与韩琦知扬时期的诗文对照可以明显看出，欧阳修的诗文更见个人闲适的情趣，少有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同为咏鸟之作，欧阳修的《鹭鸶》虽有以鹭鸶自比的倾向，但仅止步于“孤高”，不见怨怼，以闲情收束；而韩琦的《啄木》则不仅有着“暮趁高枝宿”的高洁，更有着“专为众蠹仇”^④的怒目圆睁，具有影射刺时的现实面向。面对冬日飞雪，欧阳修《咏雪》聚焦于雪景，结尾“应须待和暖，载酒共行春”^⑤，稍涉公共生活，而韩琦的《广陵大雪》全篇充斥着对民生的担忧。

由此可见，欧阳修在扬州任上的诗作多偏向于私人，较少面向公共生活，可见其心态上的转变。欧阳修的扬州记忆，与其所谓的“拾公之遗，以继盛美”也判然有别。他在知颍时回忆在扬州的生活：

千顷芙蕖盖水平，郡治荷花，四望极目。扬州太守旧多情。画盆围处花光合，予尝采莲千朵，插以画盆，围绕坐席。红袖传来酒令行。又尝命坐客传花，人摘一叶，叶尽处饮，以为酒令。舞蹈落晖留醉客，歌迟檀板换新声。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后无人看落英。^⑥

扬州时的欢会与颍州形成对比，让欧阳修感慨如今的寂寞无聊。回忆是对过去的重建。或许欧阳修在扬州任时有不少为政举措，但他的回忆却充斥着纵情行乐。可见在他看来，扬州时光的基调是远离政治生活的。知扬时期与嘉宾歌妓的酒宴行乐正是常在平山堂举行。叶梦得《避暑录话》载：

① 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二五《谢转给事中表》，巴蜀书社，2000，第824页。

② 同上书卷一《扬州亭壁题名记》，第711页。

③ 诗：《答谢判官独游幽谷见寄》《赠歌者》《金凤花》《鹭鸶》《野鹊》《樵者》《招许主客》《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中秋不见月问客》《紫石屏歌》《别后奉寄圣俞二十五兄》《木芙蓉》《咏雪》《青松赠林子》《送田处士》；词：《夜行船》（忆昔西都欢纵）；文：《扬州谢上表》《与韩忠献王书（七）》《与杜正献公（一）》《尚书主客郎中刘君基志铭》《陇城县令赠大常博士吕君墓志铭》《海陵许氏南园记》《祭苏子美文》《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与王文恪公乐道》《月石砚屏歌序》《大明水记》《与李留侯公谨》《太子中舍梅君墓志铭》《祭尹师鲁文》《尹师鲁墓志铭》。参见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④ 同①书卷一《啄木》，第8页。

⑤ 欧阳修撰，刘德清等笺注：《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八《咏雪》，中华书局，2012，第925页。

⑥ 《欧阳修全集》卷十一《答通判吕大博》，第189页。

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①

这段材料明确将欧阳修与宾僚妓女宴饮的场所确定为平山堂,从邵伯湖取荷花摘叶以行酒也颇具风流色彩。

欧阳修有词集《平山集》传世。宋刊《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三附罗泌跋云:“(欧阳修)有《平山集》盛传于世,曾慥《雅词》不尽收也,今定为四卷,且载乐语于首。”^②《平山集》在北宋已经流传,如今无法知晓其命名是否出自欧阳修本人。小词于北宋体格不高,多为宴饮欢娱时所歌,“平山”之名无论是否由欧阳修自定,都可见出扬州平山堂所承载的是一段并不面向政治生活的“独乐”记忆。

欧阳修在扬州的境况以及平山堂所承载的记忆,不仅与他向韩琦信中所言迥异,还与庆历年间士大夫们的“众乐”主调颇不相牟。新政失败后,变革派纷纷外任,在孟子升格运动和宋代士大夫主体精神高扬的影响下,以范仲淹、欧阳修、韩琦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将“与民同乐”的思想贯彻到地方政治的实践和书写中。^③范仲淹于庆历六年应滕宗谅之邀写就《岳阳楼记》,“先忧后乐”的主题洋溢着士大夫主体的责任感。在滁州任上的欧阳修先后创作出《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将“众乐”的主题嵌入营造的景观中。欧阳修的滁州记忆,也打上了“众乐”的烙印,如其《忆滁州幽谷》回忆滁州生活,虽然全诗充斥着光阴荏苒的慨叹,但对“野老犹能说醉翁”^④的描写依然携带着“众乐”色彩。韩琦《众春园记》、梅尧臣《览翠亭记》、刘敞《东平乐郊池亭记》等诗文的书写,都挥洒着“众乐”的政治理念。这一理念也在仁宗朝正式成为两宋士大夫的集体崇尚。

景观作为一种纪念碑,一方面标识着地方长官在任期间的政绩,另一方面还体现着官员所留存的理念与精神,所以“众乐”作为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常常与景观的营造和书写相携。而在“众乐”的集体奏鸣中,欧阳修营造的平山堂却成为其中的变奏,体现着“独乐”的闲情与自适,和庆历士大夫精神格格不入。在今天可见的欧集中,欧阳修直到嘉祐元年才第一次直接描写平山堂。在其知扬时,梅尧臣于夏、秋两度过扬,^⑤盘亘数日,亦曾游蜀冈大明寺,但并没有留下描写平山堂的诗文。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在“众乐”为主的时期,平山堂自适的“独乐”内涵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欧阳修、梅尧臣也正是因此才没有创作直接描绘平山堂的诗文。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的政见和心态逐渐发生变化,由积极进取趋于保守持重。

① 叶梦得:《避暑录话》,第7页。

② 《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载吴昌绶、陶湘辑:《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3页。

③ 王启玮:《论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中的“众乐”书写》,《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

④ 《欧阳修全集》卷十二《忆滁州幽谷》,第201页。

⑤ 梅尧臣庆历八年五月携刁氏归宣城道经扬州,与欧阳修论文夜话。八月,赴陈州,再次途经扬州与欧阳修会晤,此次客扬有诗《与夏侯绎张唐民游蜀冈大明寺》,可见其对平山堂不可能一无所知。参见张师曾编,吴洪泽点校:《宛陵先生年谱》,载《宋人年谱丛刊》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第832页;朱东润:《梅尧臣编年校注》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第521页。

全相卿指出，欧阳修在庆历八年三四月间撰写的《尹师鲁墓志铭》中，有意在尹洙平生政治纠葛上含糊其辞，体现出他外任后产生的避党观念。这意味着在政治理念上，欧阳修逐渐由进取走向平和。^①此文撰写的时间正是在他赴扬州不久之后。总之，随着新政失败的打击、外任环境的改换和张甥案阴霾的散去，在诸多条件交织下，欧阳修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面向公共生活喧闹的“众乐”声中，欧阳修在他的平山堂走向了闲情与自适。平山堂作为欧阳修知扬时营建的标志性景观，凝结了他“独乐”闲情的内涵。然而在士大夫群体的“众乐”景观书写中，欧阳修面对道德的负累，无法坦然书写个人“独乐”，造成了从平山堂的营建到嘉祐元年的八年间，其本人没有任何诗文直接描写平山堂的现象。

二、顺应、躲避与对抗：嘉祐初士大夫群体的平山堂书写

平山堂落成后，一直没有士大夫对之做过正面的书写。直到嘉祐初年，梅尧臣、刘敞、王安石以及欧阳修本人才先后以平山堂为主题进行诗词创作。在这场群体书写中，文人们有着不同的处境和触发机制，面对以闲情自适为记忆承载的平山堂，展现出或顺应、或躲避、或对抗的姿态。

（一）梅尧臣的顺应

这场集体书写，由梅尧臣首开其端。至和二年（1055）秋，梅尧臣结束为嫡母束氏守丧，^②北上入京，途中客于扬州；至次年春夏之际方才离扬，秋初抵达汴京。在扬州时，梅尧臣与友人游蜀冈，至平山堂，接连创作了《平山堂杂言》《大明寺平山堂》《平山堂留题》。为便于分析，录全篇如下：

平山堂杂言

芜城之北大明寺，辟堂高爽趣广而意厖，欧阳公经始曰平山，山之迤迤苍翠隔大江。天清日明了了见峰岭，已胜谢朓颯颯远视于一窗。亦笑炀帝造楼摘星放萤火，锦帆落樯旗建杠。我今乃来偶同二三友，得句欲□霜钟撞。却思公之文字世莫双，举酒一使长咽慢肌高揭鼓笛腔，万古有作心胸降。^③

大明寺平山堂

陆羽烹茶处，为堂备宴娱。冈形来自蜀，山色去连吴。毫发开明镜，阴晴改画图。翰林能忆否，此景大梁无。^④

平山堂留题

蜀冈莽苍临大邦，雄雄太守驻旌幢。相基树楹气势厖，千山飞影横过江。峰峽俯仰如奔降，雷塘坡小鸕鹚双。陆羽井苔黏瓦缸，煎铛泻鼎声淙淙。雨牙鸟爪不易得，碾雪恨无居士鹿。已见宣城谢公陋，吟看远岫通高窗。^⑤

① 全相卿：《北宋欧阳修撰尹洙墓志铭公案新探》，《文艺研究》2024年第2期。

② 梅尧臣皇祐元年后事迹系年本文多据吴孟复：《梅尧臣年谱》，载《安徽文献研究集刊》，黄山书社，2006，第31-56页。

③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六《平山堂杂言》，第1021页。

④ 同上书卷二十六《大明寺平山堂》，第1015页。

⑤ 同③书卷二十六《平山堂留题》，第1104页。

三首诗创作时间的先后没有明确记载。《平山堂杂言》篇尾感慨梅尧臣等人面对平山堂景色的触动,胸中诗句即将脱口而出;但想到欧阳修才学文字举世无双,只好作罢。由此看来,梅尧臣创作《平山堂杂言》前没有过关于平山堂的相关题咏,因此我们将其列为第一首。虽然欧阳修此前并没有留下吟咏平山堂的文字,但梅尧臣却感到了欧阳修作为先在诗人所带来的焦虑。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这种焦虑一方面因为欧阳修此时在士大夫间有着极高的声誉,面对他所营建的景观不能不想到其卓绝才情;另一方面欧阳修作为平山堂的所有者,已经赋予其特定的人文内涵,虽然没有文字题咏,但后来的诗人依然可以感觉到欧阳修的“在场”。有趣的是,梅尧臣以不作为作,在言说的同时吐露了无法言说的焦虑。在诗中,梅尧臣援引了同在蜀冈营建宫殿的隋炀帝的典故,嘲笑他大费周折,不如平山堂借山川大江的景色得来轻松。又提及谢朓“窗中列远岫”句,与以窗户框定风景相较,凸显平山堂景色之壮阔。

梅尧臣在欧阳修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下,依然另外创作了两首诗。《大明寺平山堂》终于对平山堂所承载的个人闲情不再避而不谈,首联便揭示出其“备宴娱”的特点,尾联直接与欧阳修隔空对话。是诗与《平山堂杂言》同样体现着欧阳修对平山堂的影响。《平山堂留题》展现出对《平山堂杂言》和《大明寺平山堂》在内容上的综合,再次重复提及陆羽和谢朓。与前两首诗作不同的是,《平山堂留题》更反映出平山堂对公共生活的逃避。“碾雪恨无居士庞”句,“碾雪”指碾茶,“居士庞”指庞蕴,其初以儒为业,后参禅悟道,游于世外,但终身不改儒服。末尾“已见宣城谢公陋,吟看远岫通高窗”,再一次提及谢朓“窗中列远岫”句,此句出自谢朓出任宣城太守时所作《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诗》。谢朓在朝时面对宦海风波的险恶,常常处在仕与隐的矛盾中;作牧宣城后,以郡斋高卧寄情山水的姿态成为后世吏隐的典范。

通观梅尧臣三首诗,无论是观览平山堂而引起对欧阳修的崇敬和怀念,还是与其隔空对话,欧阳修的影子都贯穿始终。梅欧的友谊是宋人士大夫中的一段佳话。梅尧臣作诗时,距离上次二人皇祐元年(1049)相见已经六七年光阴。彼时,梅尧臣奔丧归宣城,欧阳修则自扬州赴颍州,二人道经涡口得晤。梅尧臣此次北上赴京,也将与刚刚使北还朝的欧阳修相见。可以说,对欧阳修思念的触发让平山堂的书写不再沉寂。梅尧臣居丧宣城前虽在汴京为官,但仅为监永济仓,久沉下僚,生活艰辛,在京时就常常感慨不如长居林下。两首诗作皆提及谢朓宣城之诗,反映了梅尧臣内心的挣扎——此行将赴京为官,同时又难以割舍居宣城时的沧州之趣。总之,梅尧臣的处境与心曲,造成了其诗对个人闲情的渴望和对友人的思念,而这与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的“独乐”内蕴正好契合无间。

(二) 刘敞的躲避

嘉祐元年二月,刘敞与欧阳修先后使辽回京。闰三月,刘敞自请离京,出知扬州。对于刘敞的外任,《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欧阳修所撰《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①皆言因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中华书局,2004,第4399页;《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五《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第525页。王兆鹏《欧阳修对扬州平山堂景观的建构与书写》(《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及肖鹏、王兆鹏《欧阳修〈朝中措〉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皆从此说。

其表兄弟王尧臣任参知政事，为避亲嫌而自请。然而，楼钥却认为别有隐情：“公是先生望隆一时，而不容于朝，出知扬州，欧阳公所为赋平山堂之词也。”^①进而需对刘敞外任扬州的原因稍作探索。

官员避亲之制在先秦已见萌芽，初步形成于两汉。宋人为走出唐末五代困境，避亲制度自太祖朝以来逐渐趋于严格。然而刘敞作为王尧臣的姑表兄弟，在王尧臣任参知政事后是否一定要离京外任呢？我们可以对仁宗朝其他避亲例子略做考察：

（景祐）五年三月六日，翰林学士李淑言：“伏见恩制，臣父若谷蒙授参知政事，臣忝服近列，理合避嫌……”诏换翰林侍读学士。^②

嘉祐元年三月，枢密副使、给事中王尧臣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给事中程戡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以戡与宰臣文彦博为姻家，故易之。^③

三年三月，以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范镇知制诰，太常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冯京为右正言、龙图阁待制。镇与京同试中书，而京宰相富弼婿，故以待制命之。^④

第一则材料中李若谷为参知政事，其子李淑以避亲嫌为由上书请求改官，于是由翰林学士改任翰林侍读学士。第二则材料中程戡为参知政事，因其女嫁与宰相文彦博之子，故为避亲而以王尧臣代之，程戡则改任户部侍郎、枢密副使。第三则材料中冯京因为宰相富弼之婿，与范镇同试中书，因避亲只任龙图阁待制，而以范镇为知制诰。由此可见，在仁宗朝官员任职宰辅，其亲属虽需避嫌，但并不一定要离京外任。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王尧臣任参知政事，除刘敞外，王洙亦需避亲改官：

（嘉祐元年闰三月）辛卯，翰林学士王洙为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知制诰刘敞知扬州。敞，王尧臣姑子；洙，尧臣从父，尧臣执政，两人皆避亲也。洙罢一学士，换二学士，且兼讲读，国朝未尝有。知谏院范镇请追还过恩，且令洙依敞例出补外官，又言洙在太常，坏陛下礼乐，为学士时，进不由道，资性奸回，恐终累尧臣。章六上，卒不报。^⑤

王洙作为王尧臣的叔父，其关系远较作为表亲的刘敞更为亲密，但他避亲改官并未外任，只是由翰林学士改为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范镇对此非常不满，接连六次上书，认为王洙应该与刘敞一同离京补外官。其实，按照上引景祐五年（1038）李淑避亲改官的例子，由翰林学士改任侍读学士并非不合制度，只是王洙同任侍读、侍讲与刘敞的外任比起来显得有些突兀。范镇所言重点在于王洙曾“在太常，坏陛下礼乐，为学士时，进不由道，资性奸回”。此语指至和元年正月，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逝世，宦官石文彬迎合仁宗之意，提议用皇后的丧仪为张贵妃治丧，刘沆、王拱辰、王洙等人皆附议。^⑥随后仁宗下诏为张贵妃辍朝七日，并追册其为温成皇后。这一做法引起枢密副

① 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七十四《欧公与刘原甫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1328页。

②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三万四百八《职官六三》，中华书局，1957，第3813页。

③ 同上书卷三万四百八《职官六三》，第3814页。

④ 同③。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第4399页。

⑥ 同上书卷一百七十六，第4249页。

使孙沔和台谏官的反对,孙沔直言此举“皆由佞臣赞兹过举”^①;然而,即使众官自请外任,仁宗也不为所动。随后,在为温成立忌的问题上再起风波。孙沔、刘敞、蔡襄、张洵、范镇等人皆连上书反对立忌。对于温成皇后庙是否用乐舞,判太常寺王洙未与同僚商议,私自命礼官填写印纸逢迎上意,太常博士吴充、太常寺太祝鞠真卿欲送礼官于开封府治罪。^②

温成皇后逝世事件中,凡逢迎仁宗者,事后皆得拔擢:刘沆任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洙违背常制任翰林学士;^③宦官石全彬任宫苑使、利州观察使,不过三日又改任入内副都知。刘敞认为奖掖过当,封还词头,仁宗从之;然而至和二年二月,石全彬依然改任副都知。^④反对追册温成和立忌的官员,除台谏官外,皆陆续落职或离京。孙沔离京知杭,张洵监潭州税,蔡襄于次年以老母年迈自请知泉州,^⑤吴充知高邮军,鞠真卿知淮阳军。冯京、范镇等人言吴、鞠二人无罪不当补外,然而冯京亦落职;刘敞为冯京进言,不报。卷入这场风波的反对派官员,仅刘敞尚在京为官。嘉祐元年王洙与刘敞避亲改官,二人境况之别,可见余波犹在。由此可推知,刘敞虽然以避亲为理由离京知扬,但背后却暗含了宦海争斗的身不由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阳修于刘敞临行前于家中设宴,作《朝中措》(平山阑槛倚晴空)。其时欧阳修年长体衰,为目疾所困,全无曾经的锐气;虽然身处朝堂,名声日隆,但并不受仁宗信任,^⑥他在嘉祐年间也多次请求外任。因此,当欧阳修在送别“不容于朝”而离京的刘敞出知扬州时,以“衰翁”自称,嘱咐时年三十八岁的刘敞“行乐直须年少”,在扬州平山堂多多欣赏山色水光,痛饮挥毫。此时距离欧阳修始建平山堂已经过去八年,其心态由起初的意气风发转为散淡保守。面对被迫外任的刘敞,欧阳修写下劝其及时行乐的词章,吐露自己的扬州记忆,展现平山堂的“独乐”内蕴。

刘敞到任后于嘉祐二年登临蜀冈,游平山堂,作《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云:

芜城此地远人寰,尽借江南万叠山。水气横浮飞鸟外,岚光平堕酒杯间。主人寄赏来何暮,游子销忧醉不还。无限秋风桂枝老,淮王先去可能攀。^⑦

全诗充满闲情自适之感,可谓不负欧阳修临别时的规劝。该诗寄送至汴京后,欧阳修、梅尧臣、刘敞等人皆有和作,这些诗作的内容总体上与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的“独乐”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六,第4254页。

② 同上书卷一百七十七,第4288-4289页。

③ “故事,翰林学士六员,时杨察、赵槩、杨伟、胡宿、欧阳修并为学士,于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复同除学士,洙盖第七员也。温成皇后之丧,洙钩摭非礼,阴与石全彬附会时事,陈执中、刘沆在中书,喜其助己,故员外擢洙。议者非之。”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七,第4279页。

④ 同①书卷一百七十七,第4291-4292页。

⑤ “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权知开封府蔡襄为枢密直学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请也。襄工笔札,上尤爱之,御制李用和碑文,诏使襄书。后又敕襄书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诏职也。’卒辞之。”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九,第4326页。

⑥ 陈师道《后山谈丛》载:“韩魏公屡荐欧阳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复荐之曰:‘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上从之。”可见仁宗并非愿意重用欧阳修,而是迫于其在士林中的威望。参见李伟国点校:《后山谈丛》卷五,中华书局,2007,第66页。

⑦ 刘敞撰,黄寿成点校:《公是集》卷二十五,载《儒藏精华编》第21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370页。

之闲情相合。^①然而刘敞的自请外任并非源自其内心的散淡，实是时局所迫的无奈之举，他会如欧阳修所言在扬州耽于个人之乐而不顾公共生活吗？刘敞于嘉祐三年四月改知郟州，在扬州的三年中，还留下了另一首游览平山堂的诗作：

再游平山堂

背城历历才十里，经岁悠悠能一来。可惜簿书捐白日，强从宾客宴平台。暮云自与千山合，醉眼时令万字开。老子谁怜兴不浅，黄花欲落更添杯。^②

诗作中虽然闲情逸趣依然，但开篇云“背城历历才十里，经岁悠悠能一来”。可见，刘敞在扬期间其实很少到平山堂享受闲情，那么他扬州记忆的内蕴与欧阳修所嘱咐的是否一致呢？

刘敞在游蜀冈时想到避世隐居之人，感慨“不能问姓名，聊作招隐唱”^③。可见他此时的心态与欧阳修遭受政治打击和疾病摧残后的消散迥乎不同。嘉祐二年冬，刘敞又于蜀冈另筑时会堂，作《时会堂二首》和《时会堂诗序》。刘敞面对地脉连蜀、可产蒙顶茶的蜀冈，并没有纵情享乐，而是以不敢忘君的姿态，强调此茶作为贡品“宜久服，能轻身、除疾、却老。诚有是者，岂非臣子至愿哉！”修建时会堂则是为了“将率官属修职贡于此焉，且使来者世世勿忘服也”。^④ 欧阳修见到刘敞时会堂诗后有和诗二首，自注云：“余尝守扬州，岁贡新茶。”^⑤显然，欧阳修在知扬时也曾以蒙顶茶进贡，但在其涉及扬州的诗文中鲜有提及，只在刘敞时会堂诗的触发下，才在和作中回忆起贡茶事。可见，公共生活虽然是欧阳修扬州时光的事实组成，但并非他扬州记忆的主调，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错位。时会堂的修筑带有鲜明的政治生活面向，与同在蜀冈的平山堂形成对照；前者要“使来者世世勿忘服”，而后者“经岁悠悠能一来”。刘敞被迫外任，但心向朝堂，通过修筑时会堂，避开了欧阳修平山堂闲情“独乐”的内涵，重建了属于自己的、积极面向政治生活的扬州记忆。

（三）王安石的对抗

至和元年舒州通判任满的王安石赴汴京，直到嘉祐初，在京先后任群牧判官、提点开封诸县镇公事，然而他并不希望久留京城，屡次上书请求外任，希望在“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⑥。嘉祐二年四月，王安石终于等到了外知常州的任命。五月离京赴常，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为其饯行，梅尧臣作《送王介甫知毗陵》云：“今君请郡去，预喜民将苏……学诗闻已熟，爱甘理岂无。”^⑦表达对王安石出守一州的期待，与刘敞临行前欧阳修所赠之语截然不同。

① 欧阳修作《和刘原甫平山堂见寄》，刘敞作《平山堂》，梅尧臣作《和永叔答刘原甫游平山堂寄》《依韵和永叔内翰酬寄扬州刘原甫舍人》。这些和作整体上表现了退居朝堂之外的闲情，其中梅尧臣《和永叔答刘原甫游平山堂寄》尾联云：“刘郎寄咏公酬处，夜对金盃步辇还。”可见刘敞外任实出于无奈，内心依然渴望重返京城。

② 《公是集》卷二十五《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第370-371页。

③ 同上书卷九《蜀冈南麓》，第120页。

④ 同②书卷三十四《时会堂诗序》，第507页。

⑤ 《欧阳修全集》卷十三，第214页。

⑥ 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卷七十四《上执政书》，中华书局，2021，第1288页。

⑦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七，第1158页。

王安石在赴常途中,六月道经扬州与刘敞相聚共游平山堂。赵令畤《侯鯖录》载二人相会时的场景:

王介甫诡诈不通外除,自金陵过扬州,刘原父作守,以州郡礼邀之,遂留。方营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辩论久之,遂去营妓,顾介甫曰:“烧车与船。”延之上坐。^①

我们无法知道刘敞备列营妓宴请王安石是否在平山堂,但王安石在扬州对纵情享乐表现出了明显的对抗态度。以此可以想见,他也将以不同于欧阳修、梅尧臣和刘敞的姿态面对承载着“独乐”内涵的平山堂。

此时大概与刘敞作《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时间相去不远,王安石也在平山堂留下诗作。欧阳修对平山堂题咏唱和兴致颇高,得知王安石有诗题咏,还曾写信索求。^② 欧阳修在看到此诗后的反应或许会惊讶或者不满,因为这首诗建立在对平山堂内涵误读的基础上,与诸公唱和之作格格不入:

城北横岗走翠虬,一堂高视两三州。淮岑日对朱栏出,江岫云齐碧瓦浮。墟落耕桑公恺悌,杯觞谈笑客风流。不知岷首登临处,壮观当时有此不。^③

平山堂“一堂高视”的独特位置,隐约望见对岸三州。其中金陵为六朝故都,真州与润州亦为六朝重镇。诗的前三联皆与欧阳修的平山堂内蕴并无二致;然而尾联笔锋一转,王安石的目光透过三州,穿越时空,望向六朝,由此而想到地理位置并不相干的岷首山,想到羊祜。作为强者诗人^④的王安石,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非凡的创造力,他的平山堂也不再是欧阳修的平山堂,不属于烹茶的陆羽、参禅的庞蕴或是吏隐的谢宣城,而是即将投入政治理想实践中的平山堂,没有闲情自适的“独乐”,只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⑤的跃跃欲试。王安石对欧阳修的对抗与修正,其触发机制并非仅仅来自诗学的焦虑,更是作为青年政治家对声望隆盛的前辈的焦虑,是对这位被士林称为“今之韩愈”^⑥的前辈政治家的保守理念的焦虑。

三、重构平山堂:苏轼的平山堂书写

作为欧阳修门生的苏轼曾数过扬州,元祐七年(1092)更是任扬州知州。在其知扬前,过平山堂有明确记载的当有四次。一过平山堂为熙宁四年(1071)十月自京赴杭外任途中。二过平山堂为熙宁七年十月由杭赴密途中,与知州王居卿宴于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为元丰二年(1079)四月由徐州赴湖州任途中,此次系年见《苏诗总案》云:“访鲜于侁,同张大亨游平山堂,作《西江月》。”^⑦四过平山堂为元丰二年八月,在湖州任上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官差押解入京,途径平山堂,《宋史》鲜于侁本传载:“苏轼

① 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鯖录》卷三,中华书局,2002,第93页。

②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五《与王文公书三通(二)》,第2368页。

③ 《王安石文集》卷二十二《平山堂》,第353页。

④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第3-12页。

⑤ 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卷三《与诸子登岷山》,中华书局,2018,第231页。

⑥ 《后山谈丛》卷五,第66页。

⑦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八,巴蜀书社,1985,第5页。

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佯往见，台吏不许通。”^①

苏轼首过平山堂时欧阳修尚在，未留下题咏文字。与其一同宴饮相聚者有刘摯、孙洙、刘敞，三人皆因与王安石政见不睦而出任地方，他们与苏轼在平山堂上所谈内容如今不得而知，但在分别后苏轼寄《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②诗，其中所论多及新法，^③由此可以想见四人相会畅谈的内容。因此，可以推知平山堂在苏轼的记忆中很难葆有闲适“独乐”，更多则以带有政治色彩的空间呈现。

二过平山堂距欧阳修辞世已有两年。苏轼由杭赴密，与孙洙同至扬州，知州王居卿宴于平山堂，苏轼作《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

高会日陪山简醉，狂言屡发次公醒。酒如人面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江上飞云来北固，槛前修竹忆南屏。六朝兴废余丘垄，空使奸雄笑宁馨。^④

首联醉与醒形成鲜明对照，酒至半酣人渐醉，但所发之狂言却并非醉后信口妄言。查慎行认为“狂言”指苏轼与孙洙、王居卿论林逋之诗，^⑤然而此事并无“狂”可言，更不能与所引典故契合。^⑥中间两联状其时之境，又由此联想到江对岸的北固山和杭州的南屏山。尾联引桓温登楼远眺、叹王衍致神州陆沉的典故，感慨六朝兴废。其时王安石虽方罢相，但变法依然在新党的主持下如火如荼。孙洙亦是因变法自谏院出知海州，是年得内召返京，与苏轼同行至楚州分别。以此通观全诗，所谓“狂言”“次公醒”“笑宁馨”似对变法和王安石意有所指。

苏轼这首和诗虽未对平山堂进行直接书写，所述也与欧阳修无涉，但却第一次将政治生活引入了平山堂的相关创作。平山堂书写的变奏则要等到在他第三次过平山堂时，留下那脍炙人口的《西江月·平山堂》了：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说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⑦

苏轼此次经过平山堂，欧阳修已去世多年，墙壁上留下的灵动字迹和堂前的依依杨柳触动了苏轼对欧阳修的思念。通过误读，苏轼重建了关于平山堂的叙事和内涵，对平山堂的群体书写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西江月·平山堂》系年考辨

这首词的系年有两种：一系于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自徐州赴湖州任途中，以王文诰《苏诗总案》（下称《总案》）、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下称薛本）、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词集》（下称张本）为代表；一系于元丰七年十月苏轼由黄州赴汝州途中，以

①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四十四，中华书局，1985，第10938页。

②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六，中华书局，1982，第294-300页。

③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载《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第17、21页。

④ 同②书卷十二，第593页。

⑤ 同上。

⑥ “次公醒”事见《汉书·盖宽饶传》：“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宽饶不行。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向特坐。许伯自酌曰：‘盖君后至。’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参见班固：《汉书》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62，第3245页。

⑦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6，第533页。

孔凡礼《苏轼年谱》(下称孔谱)、邹同庆等《苏轼词编年校注》(下称邹本)为代表。

词中“三过平山堂下”句为系年关键。薛本虽认同《总案》将第三次过平山堂编于元丰二年四月赴湖州任途中,但对“访鲜于侁”提出质疑。^①薛本据《宋史》鲜于侁本传“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②,谓鲜于侁在元丰二年始守扬州。又查《北宋经抚年表》载:“(元丰)二年,四月丁巳,(陈)升之罢,致仕,京东转运使鲜于侁知扬州,六月甲子,见《长编》。”^③《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载元丰二年四月丁巳:“镇江节度使、同平章事、秀国公陈升之致仕……后二日,升之卒。”^④而苏轼四月二十日到湖州,薛本从而认为苏轼于四月十日左右过扬州时,扬守当为陈升之,非鲜于侁。

张本援引苏轼作于元丰二年四月十二日的《跋欧阳修家书》,云:“赴任途中,何忽作此跋,盖因盘桓扬州时见此书墨迹,故题以上数语,以是知本词亦当作于四月十二日前后。”^⑤

邹本在薛本的质疑上更进一步,认为既然苏轼过扬时鲜于侁尚未赴任,则《总案》编年不可信。另据《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西江月》题注“元丰七年过扬州”,将此词系于元丰七年十月苏轼由黄州赴汝州途中,^⑥孔谱亦据此编年。^⑦

邹本与孔谱所论看似妥帖,实则存在疏漏。其论所据一为鲜于侁元丰二年四月未至扬州。检《长编》元丰元年十一月乙酉载:“诏知扬州鲜于侁……各罚铜二十斤。”^⑧据小注此材料所本为朱本《神宗实录》。可见元丰元年十一月鲜于侁已在扬州任上。又检《长编》熙宁八年闰四月乙未:“枢密使、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陈升之罢为镇江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扬州。”^⑨宋人常制地方长官三年为一任,期满即需调离,因此元丰元年陈升之当调离扬州。且薛本所据《长编》谓元丰二年四月陈升之致仕,并未言其致仕时是在扬州任上,不当据以为证,故仅《宋史》载鲜于侁于元丰二年任扬州守,不可据。

邹、孔二书编元丰七年另一所据为《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西江月》题注。然而,宋代词集题注、小序之类多不可信。北宋时士大夫少有自编词集,多为好事者广搜旁采。东坡词集便有着文献来源多方的特点。如苏轼曾为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提供本事,^⑩今可见东坡词集中便有部分词采自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水调歌头》(三十三年漂流江海)、《满江红》(忧喜相寻)等,传本将题注中明确其源自杨绘书的表达

①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第230页

②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第10938页。

③ 吴廷燮撰,张忱石点校:《北宋经抚年表》,中华书局,1984,第315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七,第7233页。

⑤ 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第237-238页。

⑥ 见《苏轼词编年校注》,第533-534页。邹本言茅维《苏东坡全集》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皆有“元丰七年过扬州”题注,然笔者检复旦大学古籍部藏茅维编《全集》本东坡词,并未发现有此题注。

⑦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第655页。

⑧ 同④书卷二百九十四,第7167页。

⑨ 同④书卷二百六十三,第6425页。

⑩ 苏轼与杨绘书中云:“近一相识,录得明公所编《本事曲子》,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然切谓宜更广之,但嘱知知识间令各记所闻,即所载日益广矣。辄献三事,更乞揀择,传到百四十许曲,不知传得足否?”参见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杨元素》,中华书局,1986,第1652页。

如第三人称“子瞻”之类改作第一人称“余”等，演变为词序。^①词集中一些题注还辑自街谈巷语稗官野史。汲古阁《宋名家词》本《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调下有小注云：“惠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②《百家词》本、傅幹注本、元刻本皆无此小注。傅本、元本有词题作“黄州定惠禅院寓居作”^③，与汲古阁本相抵牾。汲古阁本所载题注实抄录自王楙《野客丛书》。^④而这一本事，也经历了由为黄州王氏女作到少年时为邻家女作、再到为惠州温都监女作的演绎。

综上所述，北宋由他人编纂而成的词集，文献来源复杂，且由于词的可歌性，不少词在写成后都单独流传，其题注、小序在辗转流布的过程中也极易遭到脱落、改篡、臆造，甚至同一首词的题注在不同版本中的面貌都存在相抵牾处。因此，不可以《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西江月》所载题注为编年依据，将《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系于元丰二年四月自徐州赴湖州任途中更为妥当。

（二）苏词的写作动机与影响

如前文所述，苏轼在写下《西江月·平山堂》前曾两过平山堂，一过时欧阳修尚在，二过由杭赴密时欧公已谢世两年。苏轼虽有诗作，但诗中并未流露多少对欧阳修的思念与歌咏。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苏轼在元丰二年赴湖州过平山堂时对欧阳修思念的喷薄而出呢？笔者认为，苏轼此时对欧阳修的纪念，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学术目的。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宋代学术与政治活动有着高度的互动，政治实践常常作为学术观念的外延，这为我们考察苏词的写作动机提供了思路。

为了排斥佛教、重新树立儒家之道的地位，韩愈撰写《原道》等文章，最先勾勒出儒家的道统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儒家的道自尧舜禹传至文武周公，再传予孔子、孟子。儒家的道统话语自诞生时便体现出排他性的特点。通过对道统传承的梳理，韩愈既申明了儒家的地位，也让自己能够位列其中，为自身继承儒家之道博得合法性。北宋在前中叶形成了尊韩的风气，^⑤其中标举韩愈用力最巨者即为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中，欧阳修吐露自己孩童时就倾心于韩文；十七岁时应州试未遂便感慨时人不读韩

① 《水调歌头》（三十三年漂流江海），吴讷《唐宋明贤百家词》本调下小注云：“杨元素《本事曲集》云：子瞻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后相逢于泗上，久留郡中，游南山话旧而作。”元刻本、傅幹注坡词本删去“杨元素《本事曲集》云”，将“子瞻”改作“余年十七”。《满江红》（忧喜相寻），吴讷《唐宋明贤百家词》本调下小注云：“杨元素《本事曲集》董义夫名钺，自梓漕得罪归鄱阳，遇东坡于齐安，怪其丰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忧，柳氏不能忘怀于进退也。已而欣然同忧患，如处富贵，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满江红，东坡嗟叹之，次其韵。”傅幹注坡词本略同，元刻本于“怪其丰暇自得”下补“余问之”，删“东坡嗟叹之”中“东坡”，演作词序。

② 苏轼：《东坡词》，汲古阁《宋名家词》本，第28b页。

③ 苏轼：《元本东坡乐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第59页；刘尚荣：《东坡词傅幹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418页。

④ 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87，第276-277页。

⑤ 顾永新：《北宋前中叶的尊韩思潮》，载费振刚、温儒敏主编《北大中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54-177页。

文,立志“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洛阳为官时,与尹洙等人“遂相与作为古文”^①,直至三十年后“学者非韩不学也”^②。欧阳修还将韩愈与孔孟并论:“孔、孟皇皇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③欧阳修在其时也被不少士人看作是韩愈道统和文统的继承者。庆历间曾巩便云:“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④“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⑤韩琦以鲜明的道统话语将欧阳修置于韩愈之后:“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⑥

王安石在北宋尊韩思想的影响下,经历了对韩愈从推尊信奉、再到批驳的转变过程。^⑦至和年间欧阳修赠诗王安石,将之比作韩愈,而王安石对以“他日倘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⑧,可谓是其观念的自陈。在王安石新学的道统谱系中,韩愈被放逐出去,更遑论欧阳修;而他自己,则作为接续孟子所传之道的继承人厕身其间。

苏轼作为欧阳修的门生,虽然对韩愈偶有批评,但整体上倾向于认同和推尊。他也将欧阳修视为韩愈的继承者。在熙宁五年欧阳修去世后的祭文中,苏轼展现了以欧公之学驳斥王安石新学的倾向:

民有父母,国有著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范,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⑨

苏轼将欧阳修作为斯文的象征,当其去世后,异端邪说便没有了遏制。只是,苏轼在祭文中并没有指出“异端”“小人”究竟为何;但所谓“学者至于用夷”“以为无为为善”,显然是指与韩愈、欧阳修排释斥老态度截然不同的王安石之新学。^⑩

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苏轼对于新学的贬斥则更为激烈和直接: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士无

① 《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三,第1056页。

② 同上书卷七十三,第1057页。

③ 同上。

④ 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十五《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华书局,1984,第232页。

⑤ 同上书卷十五《上欧阳学士第二书》,第233页。

⑥ 《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五十,第1551页。

⑦ 刘成国认为在人性论问题上,王安石于庆历以后逐渐跳出古文运动的藩篱,开始对韩愈等人的观点进行反思和超越。参见刘成国:《有善有恶:王安石的人性论演变新探》,《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3期。

⑧ 《王安石文集》卷二十二《奉酬永叔见赠》,第345页。

⑨ 《苏轼文集》卷六十三《祭欧阳文忠公文》,第1937页。

⑩ 王安石的新学受佛老影响实多,余英时甚至认为新学的实质为佛学,而非儒学,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第51页;卢国龙等学者则以老庄哲学观之,强调新学的道家渊源,参见《宋儒微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第141页;刘成国认为王安石的新学虽然整合百家学说,但依然以儒学为底色,参见《荆公新学研究(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第272-283页。

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①

苏轼认为孔孟之道以外皆为异端，将晋梁的覆灭归因于佛老之学，直至韩愈出现才重新确立儒家之道；欧阳修作为“今之韩愈”，方重振正道，宋朝政局的繁荣稳定便由此而来；而在欧阳修之后，王安石的新学猖獗，再次使佛老沉渣泛起，祸乱朝政。由此观之，苏轼心中的欧阳修不仅仅是接续正宗的道统传人，还是澄清风气、对抗王安石新学的旗帜。

王安石在治平年间便于江宁设帐讲学，宣扬己说。直到执政秉国，新学借助其权力风行日炽。熙宁八年，王安石主持完成《三经新义》的撰写，由国子监刻印发行，进而成为理解阐发经典的唯一标准。虽然不久之后王安石便罢相离京，但元丰年间继续奉行王安石的变革策略，新学的影响也并未因其退居金陵而削弱，天下学子对新学依然如蓬从风，趋之若鹜。

元丰初年，随着王安石罢相，变法进入另一阶段。如果说前阶段旧党攻击新法所对峙的尚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那么此时在新法背后操持改革的则是宋神宗本人。熙丰之际的政坛风气由前朝的宽松变得日渐紧张，频发的诏狱也让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委顿沮丧。^②当第三次经过平山堂时，所处的时局环境和脚下地脉通蜀的蜀冈，很难不勾起苏轼对故乡和对老师的思念，触动他对宦海颠沛大梦一场的感慨，从而发出“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的人生喟叹。同时，这一阶段王安石新学也成为宋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其“一道德”^③的风潮唤起了苏轼对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儒学正统的申明。因此，《西江月·平山堂》的写作既是苏轼个人情绪被触发后的喷薄而出，而对欧阳修的纪念又是苏轼渴求以儒学之道重新整肃风气、扭转局势的政治诉求的流露。

苏轼对平山堂的书写基于自身的历史语境。与梅尧臣、刘敞、王安石不同，他直接忽视了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闲情“独乐”的内涵，将平山堂作为欧阳修的能指，从而使个人情绪和政治诉求在此交汇，平山堂书写即以此为转折得以重构。

苏轼在写作《西江月·平山堂》后即至湖州任上，七月“乌台诗案”爆发，就逮至京；元丰三年二月，贬至黄州。是年春，秦观游扬州诸名胜，至平山堂，与友人李乐天感慨：

自还家来，比会稽时人事差少，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泛九曲池，访隋氏陈迹，入大明寺，饮蜀井，上平山堂，折欧阳文忠所种柳，而诵其所赋诗，为之喟然以叹。^④

秦观历苏轼被缚，次年游扬州时访隋朝古迹发古今之慨，在平山堂见到欧阳修所种的柳树，心中怆然。我们无法知晓秦观对欧阳修的怀念是否与时局有关，但此时的平山堂在其心中已然没有了闲情享乐的意味，完全成为了一处欧阳修的纪念碑。

① 《苏轼文集》卷十，第316页。

② 戴建国：《熙丰诏狱与北宋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③ 《王安石文集》卷七十二《答王深甫书三（二）》，第1263页。

④ 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与李乐天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008-1009页。

此年在平山堂追思欧阳修的还有苏辙。苏辙因“乌台诗案”被贬筠州,三月过高邮,与秦观相从两日。从分别时的诗作来看,^①诗案的阴霾和余波恐怕是二人交谈的主要内容。苏辙至扬州晤鲜于侁,游平山堂,感而赋诗: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对凭栏。海门仅可一二数,云梦犹然八九宽。檐外小棠阴蔽芾,壁间遗墨涕泛澜。人亡坐使风流尽,遗构仍须子细观。^②

苏辙凭栏远眺、念及欧公,但全篇不顾平山堂的闲情内蕴,而是以召公比欧阳修,临遗墨而泫然。或许我们可以将苏辙、秦观对欧阳修的怀念和苏轼之词作为同一组文本,它们产生于新学势隆的元丰初年,都是通过纪念欧阳修来隐晦地表达自己在学术和政治上的与时对抗。

苏辙之诗步武东坡之词,欧阳修其人彻底成为了平山堂的所指,其内蕴也由带有私人性质的“独乐”变为面向公共生活的美政和士大夫精神,经由他们所重构的平山堂,成为了后人书写的主要鹄的。

到宋代,君主终于不再依赖门阀士族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由科举选拔的士大夫成为政府官员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士大夫群体的主体意识得以凸显,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展开了变革,士大夫也在高扬着“共治天下”的理念中建构起独特的群体身份观念。庆历士大夫的改革,在政治实践中彰显了士大夫群体的力量。即使新政失败,改革派被迫离京,地处江湖之远,他们依然通过诗文继续着身份观念的建构。这一时期的“众乐”书写,就是一次士大夫身份观念的集体表达。也因此,改革派们虽远离中枢,在士林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欧阳修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自然处在士大夫身份观念的笼罩中;然而知扬时境况的转变,让他在“众乐”喧嚷里却耽溺于个人“独乐”。偏离身份观念而产生的书写焦虑,使得欧阳修长久没有关于平山堂诗文的创作,直到嘉祐初年欧阳修与梅尧臣、刘敞、王安石等人才展开了平山堂唱和。梅尧臣写作《平山堂杂言》时,在并无欧阳修前作的情况下,依然感到焦虑。或许梅尧臣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言说困境的原因所在,而仅仅将之归咎于欧公举世莫双的辞章盛名。其实,这份焦虑恐怕更多源于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的人文内涵与士大夫身份观念之间的错位。梅尧臣的平山堂诗作顺应了老友,从而导致了焦虑。被迫外任的刘敞在面对平山堂的“独乐”时,选择以躲避的态度另建时会堂,强调不忘君恩,从而完成了对士大夫身份的认同。而具有强烈士大夫主体意识的王安石,则以对抗的姿态应对欧阳修所带来的身份观念偏离。苏轼基于自身的处境,忽视平山堂闲情“独乐”的文化内涵,将其当作欧阳修的能指,重构其内涵。到此,欧阳修作为宋代士大夫的代表,平山堂自然也转变为士大夫身份观念的纪念碑,等待着后来者的书写。

【责任编辑:赵小华;责任校对:赵小华】

① 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九《高邮别秦观三首》,中华书局,1990,第171-172页。

② 同上书卷九《平山堂》,第173页。